



“用工荒”的发生,让企业开始重视软环境的建设问题。图为浙江某地求职者在浏览招工信息。 新华社供图

他们理应成为国策关注对象

本报记者 黄明明

就业质量的提升有多重要?“蚁族”、新生代农民工——这两类典型群体的生存状态间或可以说明问题。

2011年,我国大学毕业生有650万人。这其中,有相当部分的人不得不做“蚁族”。新生代农民工也正以“潜伏”的方式生存在各个城市中。

大规模城市化需要大量人才,每个人也都有选择留在大城市的权利。而如何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大城市,正是解决问题和出台相关政策的出发点。

为了梦想的“蚁族”

被称之为“蚁族”的有三个典型特征:大学毕业,多数从事简单的技术类和服务类工作,聚居的生活状态。

《2011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下称《报告》)估计,目前,“京蚁”、“沪蚁”、“江蚁”(武汉)、“秦蚁”(西安)、“穗蚁”(广州)这群散落在全国各大城市的“蚁族”有300万人以上,其中不乏“211工程”重点院校毕业生。

课题组在2010年3月到11月的调查中发现,“蚁族”的平均月收入约为2000元左右,略高于新生代农民工月薪(1748元),近六成“蚁族”人均居住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下,他们中近八成是“月光族”。

调查表明,聚居村和群住房的住宿条件简陋,形成了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底层及衍生经济圈,无照经营的小餐馆、小发廊、小诊所、小网吧等低档娱乐场所大量集中,入室盗窃和抢劫斗殴等治安事件频发,生活状态十分令人担忧。

同时,在就业选择上,“蚁族”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最看重的是收入待遇和个人发展,最不注重的是职业声望、职位高低、工作强度和工作压力。

近几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很多工作岗位的待遇并非令人满意,但“蚁族”并没有太强烈的返回家乡的意愿,他们依然甘做“蚁族”。调查中,更多的人表示是为了梦想和自我实现,以及大城市的良好条件而选择留下。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蚁族”对未来抱有很高的期望,57.1%的受访者认为,目前的生活状况是社会因素造成的。

“蚁族”普遍因为对梦想有希望,所以能坚持,但一旦上升通道收窄,自卑感、挫折感、焦虑感严重的“蚁族”难免会有过激举动。2011年初发生的突尼斯和埃及骚乱,起因和参与主体正是低收入大学生。”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廉思在报告中强调。

“三不像”的新生代农民工

他们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城里人,和他们的父辈也有着明显的差别。这种“三不像”的人,就是新生代农民工。

《报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意识开始觉醒。他们开始注重自己的权益保护,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在贫穷和生存的双重压力下,不管环境、工种、苦、脏、累、险重活都不加选择地承受。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没干过农活,吃苦耐劳的精神要逊色不少。他们对土地没有父辈那样的感情,对农村和家乡没有父辈那样的依恋。他们不是基于生存需求,而是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在物质要求上向城市居民看齐。

2010年2月,浙江杭州一家企业招收抛光工,企业向一名“85后”开出4000元的月薪,被对方以该工作不利于健康而拒绝。

“虽然我们不能再以这么一个简单的实例来证明新生代农民工权利觉醒,但如果把这种行为演变成一种群体行为,那对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是巨大的。”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长安表示。

由于身份的错位,现实总是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美好愿望相差甚远。他们父辈所遭受的就业歧视、拖欠工资、社会保障残缺、子女入学难等难题,新生代农民工也几乎全部“继承”下来。

以上学为例,2010年,北京海淀区教委宣布关闭30所民办农民工子弟的学校,致使15000多名学生面临失学的风险。

在各种压力下,少数新生代农民工心态失衡,产生了报复社会的心理。广东省相关部门的统计表明,近年来,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人员犯罪案件数量和比例均呈大幅上升的趋势。

佛山市中级法院发布的《2008-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调研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中超过六成在23岁以上,超过九成的被告人是冲动犯罪。

“目前,决策层已经开始着手解决由新生代农民工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和传统的城市化相比,新城市化应更注重城市质量的提高,应更强调和谐劳动关系和平等就业机会,而这正是包容性增长之应有之义。”李长安指出。

还中国式就业以尊严

本报记者 黄明明

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2011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撩起了“就业质量”这一话题。

根据该报告,如果用百分制考量,2007年全国就业质量平均得分仅为33.23分,2008年也只有34.81分。

毫无疑问,中国就业质量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

颇意味的是,国家发改委一位官员在了解到这组数据后表示,这三十几分的数据对外公布将产生不好的社会影响。在他看来,在经济和社会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如此差的就业质量,是没法交代的。

不过,这一不及格的平均分并没有引起舆论过多的关注,媒体和公众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在区域间的排名上——北京第一、上海第二、天津第三。

让人记忆犹新的是,中国的失业率、中小企业的招工难问题、“蚁族”现象、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劳资冲突事件……都曾一度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不过,鲜有人去把这类和就业相关热点事件与“质量”相挂钩。

政府是一个例外,它必须前瞻性地关注这一话题。如今,“提高就业质量”已经进入了国民经济“十二五”规划的视野。

此次报告的主编、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赖德胜,以及劳动力市场就业方面的专家和官员日前共同预警——就业质量高低关系到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在提高就业总量的同时,更应关注就业质量的提升。

一个被正视的话题

“这是一个很久以来被忽视的、正在被正视,而且将会被重视的问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王亚栋用了一个递进句,彰显了这一话题的重要。

就业质量最早以“体面劳动”的概念走进中国政府的视野源于一次争论。

2004年,国际劳工组织和中国人力资源部共同举办中国就业论坛的前夕,双方共同起草北京共识时意见就不统一。

王亚栋追忆,当时国际劳工组织要求把体面劳动写入论坛宣言中。“但我们认为,中国主要要解决的是就业岗位的问题,下岗失业人员连岗位都没有,何谈体面。”

后经过双方磋商,达成共识——就业不仅是要给劳动者提供一个岗位,更应该是个好岗位,一个真正的工作,他能从中实现自我价值。

国际劳工组织就体面就业的概念给予了详细的解释:体面劳动有四个支柱,第一是就业促进,第二是权益和劳动标准,第三是社会

保护,第四是社会对话。

有一句话让王亚栋至今记忆犹新,“就业是劳动者个人谋求发展,为家庭和子孙带来幸福,走向美好生活的一个意境和途径”。

在2004年5月的北京共识中,就业质量以“体面劳动”这一概念被提出——这是在中国文件上第一次出现。

此后,“公平就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上作为专门章节出现,也得益于此次铺垫。

2005年,当时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牵头会同发改委、财政部、全国总工会起草就业促进法草稿,专门出一章关注公平就业。

“我们提出关注就业质量,关注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情形。”王亚栋表示。

当时也有很多争论,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确实存在很多就业歧视现象,但如果写到法律中,由于缺乏工作基础和手段,没有具体的政策措施,具体实施起来没法解决实际问题。

“尽管当时各方面条件都还不成熟,但是我们还是把公平就业的旗帜先举了起来。”王亚栋感叹。

当光靠讨论解决不了问题时,负责起草的人员把就业公平的章节拿到国务院法制办,后又报到全国人大常委会。

2007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征求全民意见后,确定了把公平就业的内容加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中,才有了现在的公平就业的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出台后,社会对大学生就业中的乙肝歧视问题、外籍艾滋病患者入境就业等问题反映非常强烈,有关专家对一些专项问题也制定了具体的解决措施。”王亚栋表示。

正是通过反就业歧视,中国的促进就业公平往前再进了一大步。

直到胡锦涛总书记在2010年全国劳模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体面劳动首次出现在了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中。

失业率不是根本

对就业质量的考量是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很难有统一的界定。此次报告首次将“就业质量”评价体系引入学术界。

1999年6月,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胡安·索马维亚提出对“体面劳动”的定义,即通过促进就业,加强社会保障及维护劳动者基本权益,以开展政府、企业组织和工会三方的协商对话,来保证广大劳动者在自由、公正、安全和有尊严的条件下工作。

此外,欧盟基金会就就业质量有四个维度的理解:就业稳定性、健康和福利、技能的发展、工作和生活平衡。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宋景表示,就业质量涉及就业者主观感受以及客观环境等多方面。可以肯定的是,虽然中国目前达不到体面就业的水平,但如果仅仅把国有企业的高福利、政府机关的稳定性作为高就业质量模式来复制,这种做法是没前途的。

此次报告在结合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设计了就业质量的6个指标体系,就业环境、就业能力、就业状态、劳动报酬、社会保护、劳动关系。

赖德胜指出,就业质量不高是我国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就业质量已成为经济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就业机会不均等,就业歧视问题严重,工资增长速度慢,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仍不全面且保障水平不高,劳资关系问题突出等都是就业质量不高的表现。

此外,对中国失业率的解读似乎能从就业质量中找到答案。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际,反映宏观经济变动,特别是反映就业和失业形势的宏观指标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2009年公布的失业率为4.2%,而这—数据曾一度引起争议。

多年从事失业率数据统计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科所研究员赵立卫表示,每年的失业率数据统计都是非常认真和负责的计算,但数据与欧美比相对较低。

对于这一数据的不解,赵立卫曾与赖德胜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曾反复交流,大家达成的共识是:从统计学、劳动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一计算数据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中国目前就业方面最根本的特点不是失业率的高低,而是就业质量不高。

“按照国际劳工组织认定为就业的标准衡量,我国的实际失业率是非常低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就业质量高。问题是,中国人的就业还在贫困线上,就业不稳定、工资水平低、社会保障水平不高,工作中的穷人大量存在的问题很突出,这个题目的研究确实很重要。”曾湘泉解读。

宋丰稷亦表示,从人伦角度、社会学角度去评价,中国确实处在一个仅仅为了生存而就业这么一个状态。没有质量的就业数量是没有意义的。

事关经济增长方式

而今,业内专家共同呼吁的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以数量和速度为就业取向的现状

链接

真正意义上的“体面劳动”

1999年6月,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胡安·索马维亚在第87届国际劳工大会上首次提出“体面劳动”的概念。

体面劳动是指促进男女在自由、公平、安全和具备人格尊严的条件下,获得体面的、生产性的可持续工作机会,其核心是促进实现工作中的权利、就业平等。

体面劳动具体包括足够的劳动报酬、良好的工作环境、足够的社会保障、公平对待与被尊重、社会对话五个方面。

劳动报酬

足够的劳动报酬须保证工人不必以大量的加班来维持生活,不光能保证身体健康,也能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合理调剂。在中国,工资跟上GDP是体面劳动的底线。

工作环境

不光工作要在工人身心能够承受的范围,更要对工人有足够好的劳动保护。简言之,生产必须在不伤害精神和肉体的前提下进行。

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不能只停留在基本的医疗、养老和工伤等社会保险上,还应涉及失业救济、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

公平对待

全社会需要通过努力,重新树立尊重劳动价值的观念。其中,逐步消除对城乡户籍、本地和外地的区别对待等尤为迫切。

社会对话

这是常常被忽略的劳动者权利之一,提供畅通的社会对话渠道是保障体面劳动的前提。



富士康密集用工,导致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图为富士康在贵阳招收的员工。

新华社供图